

研究



近代的初曙

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翔 / 著

研 究



2-49
27
明清史

近代的初曙

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翔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的初曙：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高翔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明清史研究丛书)

ISBN 7-80149-379-6

I. 近… II. 高…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18 世纪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2489 号

·明清史研究丛书·

近代的初曙：

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著 者：高 翔

责任编辑：默明哲 雁 声

责任校对：闫晓琦 同 文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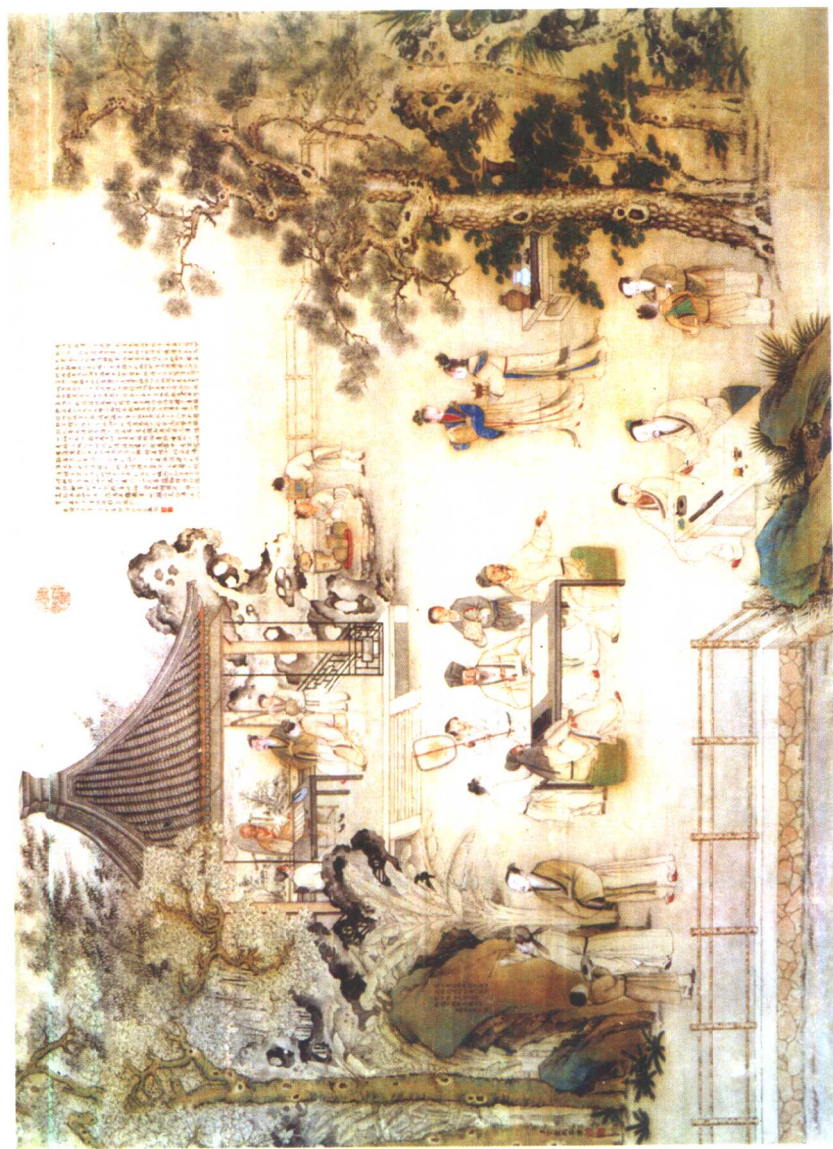
字 数：495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79-6/K·037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园雅集图

(清) 丁观鹏 现藏故宫博物院



允禧训经图轴

(清) 顾铭
现藏故宫博物院

《明清史研究丛书》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明清史研究，是在著名史学家杨向奎、王毓铨二位先生的率领之下，由众多老一辈学者奠定基础的。45年来，他们甘贫甘淡，孜孜耕耘，这块园地已是枝叶扶疏，满园姹紫嫣红。从《乾隆朝刑科题本》、《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开始，《中国史稿》明清史分册、《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明史研究论丛》、《清史论丛》、《清史资料》等，一大批学术专著和辑刊相继问世，从而显示出令人瞩目的群体优势。如今，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也由于现行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老一辈的学者业已陆续退出研究工作第一线。然而，十分令人欣喜的是，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正成长起来。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风严谨，锐意进取，已成为繁荣和发展本所明清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今年春天，本所明清史研究室的几位年轻学术带头人倡议，编纂出版《明清史研究丛书》。此一想法一经提出，即得到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同志的支持。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划，精心组稿，适逢高翔博士、宋军博士和万明教授的三部研究成果竣稿，于是丛书的出版便提上日程。据知，继高、宋、万三位同仁的大著之后，明清史研究室诸位同仁都将陆续在丛书中推出新作。

明清史料浩若烟海，明清史研究亦有甚多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和课题，在繁荣历史科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明清史研究工作者大有可为。我们希望在本书中，他日能不断刊出四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借此机会，我们谨向海内外明清史学界的诸位先进呼吁，恳请各位对本丛书的编纂出版，予以指导、支持和帮助。如蒙烦赐力作，编委会全体同仁当感激不尽。

祖武不学，无非较之诸位俊彦马齿虚长，即承他们不弃，忝任丛书主编，得以一附骥尾。其实徒具虚名，大量的工作皆是编委会诸位同仁做的。祖武唯愿竭尽绵薄，同诸位同仁一道，把这部丛书编好。

陈祖武 谨识

一九九九年九月廿三日

该书堪称关于 18 世纪中国乃至整个清代观念文化史方面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创见迭出的开拓创新之作。该书从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照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与学术、政治观念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从多角度、多层次上展示了 18 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画卷。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大大突破了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狭小圈子，拓宽了清代文化史研究领域，也使该书有关 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及其时代精神的结论更加可靠，对所谓 18 世纪中国社会“停滞说”的否定更加有力。

——赫治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以大量材料证明：18 世纪的中国社会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从而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说、静止说，特别是否定了国内外学术界仍流行的 18 世纪有考据无（或少）思想的说法。

——王思治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高翔作《18 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正好填补了这一长达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作者的全新的观念、广阔的视野，全方位地对准了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从其观念变迁来揭示 18 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探寻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因。如作者坦言：本书不是学术史，也不是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清代中国 18 世纪观念文化史的著作。作者的命题及其研究，独辟蹊

径，开创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为我国清史研究的深入启示了新方向。这同样适用于全部中国通史的研究，故本书之作，是一个范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考察18世纪中国学术的重大变革，认为是汉学之兴和对宋元以来理学思想、学风和经典著作的批判，形成汉学与理学并存的局面，但汉学显然已取得主流学术地位，而在其内部已形成了多元化的趋势，诸如“以礼代理”、反科举倾向、信仰多元化、经世思潮、西学观的出现等等，异彩纷呈，并驱争先。作者论证清代知识分子在极端君主专制的条件下，仍然提出了政治上的新观念：冲击禁区，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怀疑与批判，提出新的行政管理的理论、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民族意识、反清潜流等。所有这些新观念，便构成了清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作者做了精辟的概括，这就是：17世纪为经世、18世纪为求实、19世纪为变革。

——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对18世纪中国知识界所处的历史环境，即所继承的17世纪的精神遗产和社会关系做了概略的考察，对构成18世纪社会精神风貌的伦理观念、学术观念、政治观念等基本问题做了着重介绍和深入的概括，对18世纪以后知识界的发展趋向做了合理的剖析，实际上以18世纪为重点，刻划了清代观念文化发展全过程的轨迹，揭示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观点鲜明、新颖，颇多发明，颇多创见。读其印稿，感觉别开生面，堪称近年少见的佳作，令人惊喜。

——何龄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高翔同志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一些老问题。所谓新视角，即从观念变迁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发展。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广泛搜集资料，深入分析了18世纪（不限于18世纪）一批文化人的观念，包括伦理、道德、法律、情欲、异端等等观念形态的变迁，发掘出以前未被重视的思想火花。作者对这些思想火花，作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

这个新视角，以及由这个新视角阐发的新见解，必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的兴趣。

——王戎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目 录

导 论：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1
第一章 时代与问题	11
第一节 17 世纪的精神遗产	11
第二节 盛世与观念	31
第三节 文治与士人	51
第二章 理欲之争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94
第一节 戴震与理欲之争	95
第二节 袁枚的性情说及其伦理观	129
第三节 普遍伦理观念之变革	161
第四节 生活方式的变迁	189
第三章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	218
第一节 汉学兴起及其反理学倾向	219
第二节 独立思考与对主流学术的批判	264
第三节 主流学术内部的变革	287
第四节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上）	318

第五节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下）	369
第四章 政治观念的变革	425
第一节 极端君主专制理论的形成及其实践	427
第二节 冲击禁区：对极端君主专制的 怀疑与批判	453
第三节 汪辉祖的行政管理理论	490
第四节 普遍行政管理观念	503
第五节 危机意识、民族意识与反清潜流	526
第五章 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	542
第一节 时代精神	542
第二节 经世变革思潮的崛起	548
第三节 社会发展	578
结 论	611
附录一：主要参考书目	613
附录二：关于本书的一封信	622
后 记	629

导论：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

摆在你面前的这部著作不是学术史，也不是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观念文化史的著作。

一些工具书常常将观念和思想混为一谈，然而在笔者的辞典里，二者仍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别。思想，指的是人们对社会、对自然形成的一套比较稳定的，特别是成体系的想法。而观念不同，它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出现的生活态度、价值评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没有思想（或头脑），但不能说一个人没有观念。观念按一定原则积聚、组合，就形成了思想，思想从理论的层次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劳动创造了人，观念、以及由它构成的思想，则将人和动物最后区别开来。

在历史上，“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① 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建构人类精神大厦的基本要素。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和发展，观念既是组成人类文化的细胞，又通过符号、价值、生活方式等形式体现出自己独有的时代内涵。观念研究的目的，是从动态的角度，从

① 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一个相对广阔的视野，通过比较细致而深入的方法，展现一个时代总的精神风貌，为揭示社会变迁的内在轨迹奠定知识基础。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不是个人的专利，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形态中最活跃的、最具支配性的精神因素，它表现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是普遍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考察时代精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独有的深层文化景观，而从时代精神的基本状况、特别是从其价值取向中，我们可以预测或解释即将到来的未来。研究者要真正认识时代精神，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对该时代的社会观念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因为时代精神只能通过生动而具体的人类观念形态体现出来。

无论是个人的社会观念，还是群体的时代精神，都直接取决于客观社会存在，并受到历史传统、政治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观念研究严格置于特定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并高度重视它和社会变革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观念，从来都源于人类对客观存在的切身感受，如果观念研究，不注重社会存在，不注重个人在社会利益分配网络中的独特位置，就不可能准确发现影响社会精神因素的真正原因。但另一方面，社会是由具有不同观念的个人组成的，从人类观念的相互作用，从观念的积累，从时代精神的形成与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变迁的文化动因。一个缺乏观念的社会，必定是文化的沙漠；一个新观念、新思想稀少的社会，必定陷于僵化和停滞；一个过激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并上升为时代精神的社会，人类就会变得疯狂；一个不同观念相互冲撞而主导意识形态陷入衰落，新的时代精神逐渐形成的社会，一定酝酿着巨大的变革和动荡。

观念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将它概括为：

第一，它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它不但注重成体系的，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思想和学说（这些思想和学说本身也是由观

念组合而成)，而且高度重视那些不成体系的社会见解，特别是普通士人、民众的社会理念。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观念史研究关注的不是露出云海之上的峰峦，而且更重视云海之下大山的深邃与雄奇。它力图将历史真正还诸它的主体，那些长期被忽略、被遗忘的“芸芸众生”；

第二，观念史研究不能不建筑于对个人、特别是对群体考察的基础之上，但它绝不局限于对个人或群体的考察，努力揭示一个时代总的精神风貌始终是它最直接的研究目的；

第三，观念史研究高度重视人类精神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要从观念变迁、时代精神的角度，阐发人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和潜在规律。

由于观念史研究的范围异常广泛，因此，在具体考察中，常常需要通过对重要阶层基本观念形态的解剖，“知人论世”。本书就是这样，它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到 18 世纪的知识界，力图从知识界观念变迁的角度，揭示 18 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探寻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因。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在传统社会，知识阶层是目光最为敏锐、思想最为活跃的特殊社会集团，他们的价值观念、思想学说、发明创造，乃至其生活方式，都直接影响着其他阶层的社会生活。从知识界的观念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核。确实，不能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不能说他们是创造历史的主力，然而，没有知识阶层的社会，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健全和完整的。谈论社会变迁，研究历史发展，置知识界的精神状况于不顾，是不可思议的。

二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两个完全相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具有自己的特色：独特的自然景观，经济形态，生

活方式，喜怒哀乐，审美情趣，……所谓历史上“惊人的相似性”，首先应该是基于对时代差异的承认，对不同对象的独特个性的正视。而断代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揭示各个时代的独有特色。如果一味将五千年中华文明用“延续”或“停滞”相描述，将西方的发展历程用“断裂”与“飞跃”相概括，虽然反映了一些表象，但显然失之简单，不足以解释人类历史所提出的众多复杂问题。

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考察，在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是影响深远的大事。新中国五十年中国史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指导下，比较准确地揭示了清代中国历史独有的时代特征，从研究社会形态的角度，开创了清史研究的新局面。这一巨大学术成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社会经济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深入考察了清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以此为契机，展开或加强了对商品经济、城镇发展、区域经济、市民文化、阶级关系等领域社会变迁的研究；在文化领域，通过对启蒙思想的探讨，深入研究了清代变革思潮、反传统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带动或推动了人们对学术流变、观念变迁、大众文化等诸多相关领域的考察。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讨论，不但从基本学术思路上将新中国的清史研究和旧时代的清史研究区别开来，而且以严谨求是的学风，丰富可靠的资料，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宏大的学术气派揭示了明清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如果说今天我们对清代社会变迁、对清代思想嬗变的考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具有了一些新的理念，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些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筑于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探索基础之上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在对清代社会发展的考察中，贡献最大的两位学者是尚钺和

侯外庐。尚钺从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分析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新的历史因素，进而提出不应该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认为：“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① 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和他的其他思想史研究成果一道，开创了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新的研究途径，从而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思想史研究和传统经学史、学术史以及近代实证史学指导下的思想史彻底区别开来，它以启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为重点，系统勾画了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新思想的发展状况，揭示了中国思想领域的变革历程。学术界（包括我自己）可能不会完全同意（有人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他们二人的观点，我也不知道他们二人生前是否有过学术交流，但如果我们将他们二人的学术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得出一个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历史的全新认识，我认为就是在今天，这个认识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社会发展，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唯物观和辩证法。在具体研究中，人们应该，也不可避免地从多方面进行切入，但最主要的切入点不外乎两种：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其基本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其中心内容是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是基础的，它能揭示出某种社会形态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后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从价值观念的角度，

① 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尚钺史学论文集》，第386～390页，人民出版社，1984。